

诸葛亮研究文集

一九九七年



目 录

用人管人,不妨学学诸葛亮.....	1
诸葛亮的自我推销.....	3
诸葛亮为何失算	4
诸葛亮为何“好为《梁父吟》”	5
借鉴诸葛亮的用才观	6
对诸葛亮“事必躬亲”的辩证思考	7
从诸葛亮的早逝谈中年人保健.....	8
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	9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人失误管窥.....	14
爱才却有嫉才时——诸葛亮的人才思想与实践.....	18
诸葛亮的北伐	20
诸葛亮理财的成功经验	22
周瑜乎?诸葛亮乎?.....	23
请诸葛亮为你打天下——如何通过应征挑选合适人才.....	27
诸葛亮与俄底修斯:中西文学人物智慧代表的比较分析	29
说说“事后诸葛亮”	33
评余明侠新著《诸葛亮评传》	34
诸葛亮与三国鼎立.....	36
千古赞颂的历史名相——《诸葛亮评传》评述	38
诸葛亮和馒头.....	42
作家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差异——从“马谡之死”、“魏延之乱”看诸葛亮形象的塑造.....	43
诸葛亮研究集成》编纂始末.....	47
诸葛亮执法严明的启示.....	51
诸葛亮汉中治水.....	52
琅邪文化与诸葛亮家族文化.....	53
知己知彼 先发制人——从鲁肃三讨荆州看诸葛亮的外交艺术.....	55
评诸葛亮进驻五丈原.....	58
诸葛亮法治思想成因初探	61
诸葛亮——理想化的智慧化身	64
诸葛亮和抚夷越南北朝重归一统	66
略论诸葛亮的战略失误.....	69
诸葛亮进驻五丈原浅析.....	74
理想典范的形成及其精神误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透视	76
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	81
论诸葛亮钟情汉中的人性真实.....	86
诸葛亮伐魏不是“以攻为守”——兼论诸葛亮北伐的思想基础.....	90

略论诸葛亮的修身思想	93
诸葛亮的举贤任能	97
诸葛亮、王守仁魅力永恒——读《金筑丛书·贵阳名胜古迹》有感	98
亮的思想体系及其成败	100
诸葛亮南征新考	105
试论诸葛亮行法治蜀	110
诸葛亮巧借东风——浅析伽利略航天轨道计划中的引力助推效应	113
诸葛亮的悲与喜	119
试论诸葛亮的用人思想及其实践	126
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	129
“臭皮匠”与“诸葛亮”的不等式	134
再谈王夫之论诸葛亮	135
诸葛亮北伐新探	137
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谋略特色	143
从北伐谈诸葛亮将略之失	147
孔明也有不明时——漫谈《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人的失误	153
全国第九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综述	156
论诸葛亮多谋善断的文韬武略	157
熔事功思想于一炉——读余明侠著《诸葛亮评传》	163
诸葛亮在甘肃的足迹	164

用人管人

□ 黄新亚

不妨学学诸葛亮

诸葛亮的用人管人：对关羽可以恭维，对张飞不能恭维，对赵云要经常表扬。

对人的管理不作出统一的标准，这是诸葛亮的用人智慧。



诸 葛亮以一名躬耕垄亩的“村夫”身份，参加无权、无势、无钱、无地盘而且缺兵少将的以刘备为首的政治集团，一下子从因为占得天时从而势不可挡的曹操手里虎口拔牙，夺取了荆州、益州、汉中，在三分天下的角逐中占得一席之地，凭借的完全是

刘备自己的那一点人马。这一经营过程既好比用很少的一点本金赚了大钱，又好像一个临时成立的个体户同仁组织和财大气粗的国家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平起平坐，共同瓜分市场。这样总结诸葛亮的成功经验，对于企业家来说，实在是很有现实意义。

刘备在汝南战败投奔刘表时，“败军不满一千”，在新野积蓄力量，得徐庶支持打败曹仁攻战樊城时，大约有 3000 人。诸葛亮建议“速募民兵”，不过再增加 3000 人。这 6000 人相较曹操的百万大军虽然微不足道，却是诸葛亮帮助刘备经营事业的本钱。

刘备在这个政治集团中相当于公司董事长的地位，他既然肯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做军师——相当于聘请诸葛亮做公司的总经理，自然对诸葛亮的经营方针和措施全力支持。诸葛亮于是发挥刘

备的两个作用，一是作为汉室合法经营人的招牌作用，另一是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也就是这个集团的家长作用。所以诸葛亮发布一切命令，总是在刘备身边进行，并不自作主张。

关羽是刘备桃园结义的兄弟，相当于公司的副董事长。他有极高的武艺，有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等战绩，有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辞曹归汉的名声，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不过他又过于骄傲，对诸葛亮这样的少年书生更是不大看得起。诸葛亮不得不一方面做出点实际成绩让关羽承认，一方面尽量说些恭维话助长关羽为刘备出力的雄心，同时注意让关羽在华容道拦截这样的难题前丢点小丑，以提醒他不敢过于自负。

张飞的地位虽然次于关羽，但本领却与关羽相差不多。他那快人快语的性格还暴露出怀疑诸葛亮能力的心态。诸葛亮认为这是需要发掘的人力资源，先在博望坡用兵使他折服，再屡次激励他动脑筋解决难题，因为被人认为头脑简单的张飞一旦用计，就会使对手防不胜防。

赵云没有参加桃园结义，为了争取政治前途，只能是忠诚地为刘备效力。诸葛亮看准了赵云这一忠厚背景，总是把最关键的任务交给赵云来完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当众肯定赵云的功劳和贡献，使得赵云在诸葛亮经营蜀汉事业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诸葛亮以调动、发挥刘备政治集团各成员人力资源为基础，抓住曹操占领荆州后想一举夺取江东的急躁心理，说服孙权与刘备共同抗击曹操，并且利用曹操赤壁兵败的瞬间，夺取荆州，实现了事业经营从无到有的第一步，这已充分揭示出经营就是人的管理这一深刻命题的意义。

(汪 慧摘自《竞争与谋略》)



诸葛亮的自我推销



□文/〔黑龙江〕宋长琨 梁春生

我们在思考刘备三顾茅庐这个历史故事时，往往只注意到刘备的精诚之心，而忽略了诸葛亮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聘请，而是在隆中对中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自我推销。他在隆中为刘备精心设计了一个“兴复汉室”、“伸大义于天下”的战略决策，并且具体规定了四个阶段的目标，从而形成与曹操、孙权的鼎足之势。

刘备聆听之后，拱手道：“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至此诸葛亮自我推销大功告成。

在三国时代，天下纷争，大权旁落，皇室衰微，群雄割据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诸葛亮是一个忠诚的儒者，他深谙孔子“无道则隐”的深意，选择了隐居于林泉，求得心安神静的道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抉择。

诸葛亮隐居在隆中并不是不关心天下事，他研究过统兵谋略、治国之术，对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风俗民情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无所不学，无所不精，为他以后的出将入相、驰骋中原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学者王安石说：“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诸葛亮的治学并非刻意地为后来的出山打基础，作准备，他的治学出于广泛的兴趣和对天地人文的深刻哲思。如果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很可能终老于林泉，但这对他来说并非憾事。因为他本来就“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是有如刘备这样的仁德之君到来，他也不能不推销自己。

诸葛亮以无为的姿态从旁观者心态人生，使他的思想不被纷乱的世界所迷惑，不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也锻造了坚韧不拔、勇于开拓、深沉稳健的性格和作风。可见，诸葛亮无为之“隐”正是他日后有为之“见”的阶梯。

诸葛亮隐居于隆中并非遁世，相反他常与那些隐士纵论天下，“每自比管仲、乐毅”。真正是一个如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的人”。诸葛亮在后来出使东吴，舌战群儒时说：“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

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唯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而诸葛亮隐居于林泉，高卧于隆中的抱负是将来能布仁德于四方。

诸葛亮的恢宏气度、远大抱负和身长八尺、颀然若仙的形貌，使与他交往的人倍感倾慕，故得“卧龙”之美誉，这实际上造就了一种“势”。随着他交往面的扩大，“卧龙”之声名远播。同时，如徐庶对刘备所说：“此人只可敬见，不可屈至也。”他不想违心地去干诸侯纷争的所谓大事业，更不愿放弃自己的道德追求和政治理想。他隐居于隆中是因为缺少社会条件和人文环境而被迫的隐居。既是坚定的隐者而又胸怀大略，这使诸葛亮更具有超群的魅力。

刘备是天下闻名的仁德之君，求贤若渴，三顾茅庐之举，足见其态度诚恳。诸葛亮不失时机地出山辅佐他，实现了自己“泽及当时，名留后世”的政治理想。据史家推算，诸葛亮出山时年仅27岁，正值“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大有作为的好时候。

中国公关协会举行新春茶话会

中国公关协会于1月25日在京举行了“中国公共关系协会'96新春茶话会”，共庆中国公关协会成立10周年。协会的主席、副主席、顾问、理事及所属各部门领导及厦门、深圳公关协会在京人士共100余人出席了茶话会。

中国公关协会主席安岗代表中国公关协会向出席茶话会的同志，以及全国公关界的同仁致以新春的问候。他说，中国近年来成立了不少公关协会，有些协会由于缺乏资金，难以开展工作，而中国公关协会成立10年了，虽然经历了艰难困苦，

却没有倒下来，而是站起来了，干起来了，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事业。他希望公关界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把公关协会和公益事业搞得更好。

一些入会同志先后发言，从各地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呼吁大家求大同存小异，用大公关的手笔，把扶贫工作做好，把煤炭公关、京九铁路公关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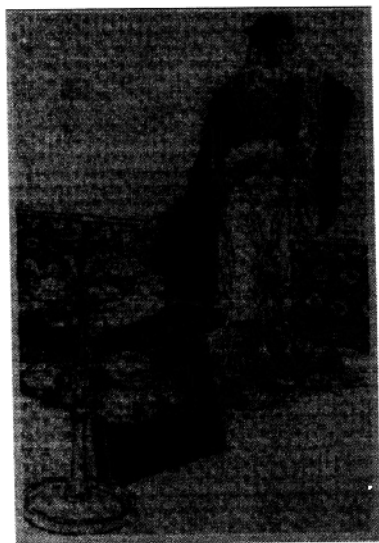
铁路文工团部分演员的歌唱，为新春茶话会平添了喜庆欢乐的气氛。

(张珂)



诸葛亮为何失算

○文/黄永明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组画面：诸葛亮用计将司马懿父子诱入上方谷，然后实施火攻，正当司马懿父子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顿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满谷大火顷刻间全被扑灭，司马懿父子乘机率兵杀出重围，得以逃生。诸葛亮最后只好望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

难道这真是天意吗？其实，这时的上方谷“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齐突出，草房内干柴都着，刮刮杂杂，火势冲天”。这骤起的冲天大火，使上方谷上大气膨胀上升，在其上空聚集起来，使上空空气的密度急剧增大，那里的气压比同一水平面上周围的气压都高，形成高压，而其附近则冷却，空气收缩下沉，上空空气密度减小，形成低压。正是这种气压差的形成，于是就造成大气运动，行成了风。同时，空气强烈受热，湿热空气在猛烈抬升过程中冷却凝结形成降水，这就是对流雨。它的强度大、历时短、范围小，常伴暴风和雷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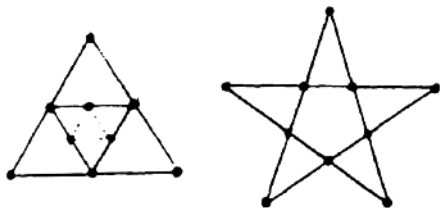
由此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天意，只不过是当时科学技术还未发展到今天这么先进，古人未能认识到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罢了。

编辑/孙利军

上期考考你答案

《牛顿解题》答案

按下面的图形裁，圆点处裁树。



《巧测汽水瓶体积》答案

先测出汽水瓶正立时汽水的高度 h_1 和倒立时空着部分的高度 h_2 ，再测出瓶底的直径 d ，由于瓶子正立时与倒立时空着部分的体积不变，那么整个瓶子就可看作底面直径为 d ，高为 $h_1 + h_2$ 的圆柱。这样，便可算出汽水瓶的容积为 $\pi \cdot d^2 / 4 \cdot (h_1 + h_2)$ 。



一代名臣诸葛亮高卧隆中，“自比于管仲乐毅”之时，“好为《梁父吟》”(见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梁父吟》本是古代用作葬歌的一支民间曲调，音调悲切凄苦，后人多有依韵填词者。诸葛亮“好为”之《梁父吟》全文如下：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此诗，《乐府诗集》载为诸葛亮所作，后又有人考证非诸葛亮所作，不管作者是谁，诸葛亮好吟诵此诗看来是确凿无疑了。此诗的意思是通过对古人的伤悼，谴责谗言害贤的阴谋，仅此而已。为何一代人杰的诸葛先生竟对此诗情有独钟以至于津津乐道呢？

诸葛亮为何“好为《梁父吟》”

● 刘明江

一般认为，诸葛亮反复吟诵此诗，是为了抒发胸中对东汉末年宦官弄权、权臣当道、闭塞贤路、忠良被屈以至于天下大乱的愤懑之情。诚然，有这方面因素，诸葛亮高卧隆中，“躬耕垄亩”，笑傲风月，并非如后来陶渊明一般看破红尘而恬淡归隐，也并非如自己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师表》)，而是时刻关注国家大事，以待天时，从他“自比于管仲乐毅”之事，就可看出其志向。作为潜在的政治家、“卧龙”，面对汉末君主“亲小人，远贤臣”、宦官弄权、权臣当道、忠良被屈的政治现实，他不能不寒心，不能不愤懑。然而诸葛亮决非一般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之辈，怎会对此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呢？我认为，他一定是从《梁父吟》中领悟出了更复杂的感受。

既知《梁父吟》，我想他肯定熟知“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知道齐相晏婴对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士的评价：“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乃“危国之器”。(见《晏子春秋·谏下篇》)虽明知这是“谗言”，这是晏子对三士的诬陷，但个中语言肯定也引起了诸葛亮的深思。虽然：“田疆古冶子”等三人不是这样的人，但在汉末当时有无“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的“危国之器”呢？显然是有的。少帝刘辩即位后，宦官段王圭、张让等把持朝政，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未遂反被张让所杀。(何进的水平较之晏子差之远矣！)少帝和陈留王被张让劫持到小平津，又被董卓劫还，董卓把持朝政后，又废杀少帝，立陈留王刘

协为献帝，于是关东各郡州起而讨伐董卓，社会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张让、段王圭、董卓及后来的李傕、郭汜和曹操都是“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的“危国之器”。而“智小而谋疆(曹操语)”的何进和各怀私心的讨董十八路诸侯又徒劳无益。这些不能不引起诸葛亮的感慨：安得晏婴再世，“二桃杀三士”般地除掉这些“危国之器”呢！应该说这是他从诗外悟出的感受。说不定他在感慨世无晏婴遂使这些“危国之器”猖獗的同时，还以晏子自诩呢。

感受不止于此。古来伴君如伴虎，功成而不身退者必无好下场，前有齐国三士，后有韩信英布，诗中透出了这个意思。“一桡何其能逢其欲”，晏婴何其能，恐怕只不过是迎合了齐景公猜忌的心理而已。诸葛亮由此陷入了矛盾的心理之中，一方面渴望出山佐政，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为功高震主的齐国三士的下场感到寒心。所以他在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的汉末没有匆匆出山，而是苦守隆中以待明主，直到刘备以大权皇叔的身份三顾茅庐，诸葛亮感其仁德，感其知遇之恩才踴躍出山。至于后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反映了他出山前的复杂心境，既忧国家闭塞贤路、忠良被屈，又忧朝纲不振、宵小欺君，同时自己又进(辅佐明主)退(隐居山林)两难，进有顾虑退不甘心。在这种忧君、忧臣、忧身的复杂的矛盾心境中，他只好凭借一曲《梁父吟》一吟三叹了。

多交些“土朋友”

○季方

元旦、春节期间,各种新闻媒体纷纷传来各级领导同志和机关人员下乡上山与普通群众交朋友的新闻。联想到时下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与上司套近乎,与“洋人”拉关系,与“大款”交朋友,笔者不禁大发感慨:领导者多交些“土朋友”好!

领导者爱交“土朋友”,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交朋友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毛主席在延安的土窑里与李鼎铭先生交朋友,采纳了他的“精兵简政”意见;周总理经常专门邀请街坊邻居到家中作客,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今天,我们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也爱和一般群众打成一片。江总书记每到一处,都要深入农村、工厂,排队了解情况,关心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的疾苦。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干群间这种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纯粹最可怜的孤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领导干部应把交友的视角投到群众之中,多交点知心的“土朋友”。这样做能直接了解群众鲜活的思想,真正听到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看到他们的疾苦与困难,获得真知、深知,变成经验和智慧,并激发实干精神,克服惰性。倘若一个领导干部生活圈子过窄,只是从家门到机关门,从办公室到会议室,下基层也是听听汇报,走马看花,时间长了势必产生官僚主义。

提出多交些“土朋友”,意在倡导一种干部与群众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当然不是说领导干部一概不能与其他人交朋友,也不是让领导干部必须把主要时间和精力花在与群众交朋友上。总之,干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交往,达到以心换心,心心相印的程度,摆在我们面前困难再大,也会被一个个克服。

干群亲密无间,试与天公比高低!

“以言代宴”好

○冯建民

据悉,山东阳信县文武部在转变隶属关系时有15名工作人员调出。他们不摆席设宴,而是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留言会”,让走的同志谈谈工作经验,提点宝贵意见,场面热烈而别致。

笔者为这种“以言代宴”的欢送方式叫好。

好就好在不俗。眼下,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只要人员变动,当领导的就忙起来了。忙什么呢?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忙七,不忙八,只忙九(酒)。”人员调入需摆宴,喝接风酒;人员调出要设宴,欢送行酒。这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了一个惯例。谁要不搞这一套,就认为你脑子有毛病,神经不正常。调入的人说你瞧不起人,调出的同志讲你不够滋味。即使滴酒不沾时酒过敬的人,到了调动之际,也愿意要这个场面,原因就是出于对“公关公关,无酒不沾;友谊友谊,酒来垫底”不良风气的无奈。而阳信县文武部以“言会”代“宴会”,确实给人一股清新感。平心而论,人员调动,大家聚一聚,喝上几杯亦属情理之中,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全党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减少人员迎来送往上的程序,破除这个惯例,实在是必要得很。有资料表明,全国有大小酒厂4万多家,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几乎平均每人

10公斤,酒后使人不寒而栗。因此,不管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方面考虑,这种“以言代宴”的方式值得称道。

知敌之害 居安思危

○彭卫平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曾在一篇题为《敌戒》的文章中写道:“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意思是说,人们都知道敌人是仇人,会带来很大坏处,却不知有敌人存在还有很大好处。他举例说:“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谄谀乃亡。”

柳宗元说的“兢兢”、“谄谀”和秦朝兴衰成亡的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增强国防观念,居安思危,对国家的发展存亡关系重大。当今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战争与和平同在,机遇与挑战共存。国外敌对势力始终没有停止过极力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我国台湾、西藏问题上制造麻烦,设置障碍,破坏我国和平统一大业和民族团结,大肆散发“中国威胁论”……所有这些,都是坏事,但它提醒我们面对公开和潜在的敌人,面对公开和潜在的威胁,面对渗透与反渗透、分裂与反分裂的尖锐斗争,更应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自觉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居安思危,树立牢固的国防观念。

借鉴诸葛亮的用才观

○张忠

三国时蜀汉名相诸葛亮辅助刘备、刘禅父子,三分天下,鼎足其一,其功业称得上是彪炳千秋。诸葛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选拔、使用人才,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在诸葛亮著名的《出师表》中,他劝谏后主刘禅重用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蒋琬等人,要刘禅“亲之信之”,因为他们都是“忠良死节”之臣,并且针对主君的弱点告诫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把用人问题上是否以德为主,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关心。具体到军事将领,诸葛亮更加明确地提出:作为一个将领,必须要有先具奋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等品德,要有勇敢的牺牲精神,不畏艰难的坚强意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公道正派、赏罚分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胸怀大度,宽厚待人,言而有信,礼贤下士,明辨是非,谨慎周密,热心助人,忠君报国,还要具备审察敌情、周密计划的处事能力,明察善断的监管能力,善知彼己、审时度势、多谋善断的决策能力。只有这样德才兼备的将领才是一名合格的军事将领。

由此可见,在选拔和使用人才中,品德和才能这两个标准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都不是合格的可用之才,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中,德才两者的内涵有所区别而已。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中,更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我们的事业需要各种具备专业技能、学有所长的人才,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人才选拔出来加以使用,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永不变色。

对诸葛亮

“事必躬亲”的辩证思考

□ 耿相魁

领导科学中讲领导方法,往往提到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怎样看待领导的躬亲行事呢?我觉得,应作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

对于事必躬亲,首先应当肯定,这是事业心极强的表现。一定范围内的躬亲行事,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也是做一个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一生,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官,为了建立、巩固并发展蜀汉刘氏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事必躬亲,是受其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事业心所驱使,为了报刘氏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他夙兴夜寐,呕心沥血,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曾评论诸葛亮: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了。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妥帖。他“自校簿书,汗流竟日”,是为了使发布的命令、起草的文件更准确;“罚二十以上”皆“亲揽”,是为了使制定的法律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诸葛亮事必躬亲,其精神是值得称道的。重要的文件和讲话,重要的措施和事情的决策,重大问题的筹划,领导就要亲自动笔,亲自去做;领导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些也是我党一贯提倡的,至今也不过时。从严理政,一丝不苟,深入实际的作风,更有现实意义。这和我们现实中的个别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有些领导,惯长于作“甩手掌柜”,对具体事情一点不了解,遇事只知推诿或签字,几十万上百万元人民币被骗而不知晓,离了汽车代步不能走路,离了秘书代劳便不能讲话。他们确有必要学习一下诸葛亮的事必躬亲的精神,勤于政务,谨慎治业,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

事必躬亲的精神值得赞扬,但不能要求每个领导者每样事情都必躬亲。事必躬亲的另一面反映出

了领导在用人上的不得法。

诸葛亮事必躬亲,历朝历代评论很多,说法不一。即使在三国时期,也有人认为这一作法不妥。据《襄阳记》载:诸葛亮的丞相主宰杨颉,就当面对诸葛亮的这一做法提出非议。“亮尝自校簿书,子昭(杨颉)直入谏云云。亮谢之。颉死,亮垂泣三日。”杨颉到底谏了些什么呢?他先“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日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废神困,终无一成”。接着,他以家喻国,深入一笔,“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为之士大夫。故陈吉(西汉宣帝时丞相)不问横道死人而忧中喘,陈平(西汉惠帝时丞相)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杨颉举这两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丞相要干丞相应做的事,不应去干下级应干的具体工作,越俎代庖。杨颉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杨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作为领导人,尤其是高级领导人,主要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应一级抓一级,层层负责。必要时干预甚至包办一下下级的工作,是应当的,但若这也不放心,那也看不惯,把本属于下级干的大量繁杂而具体的工作包起来,不管动机如何,效果是不会好的。这就等于是本末倒置,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工作能力再强,本领再大,精力再充沛的领导干部,如果不善于用人,事事都由自己包揽,事必躬亲,不仅自己会累个半死,而且也会限制同事和部下才能的发挥,打击其积极性和开拓精神,事倍功半,又不利于人才的锻炼和培养。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杨凤超

从诸葛亮的早逝 谈中年人保健

□李 明 (山西襄阳 265200)

诸葛亮为何英年早逝?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其死因有二。一是操劳过度。“事无巨细,咸决于亮”,长年疲劳,积劳成疾。二是食居无常。“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说明睡眠不足,营养欠佳。

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难道他还不懂得养生之道吗?非也。这个问题诸葛亮早就作过回答。“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率先帝之遗愿”。他是为了当时的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不少中年人,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健康状况已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据有关部门对全国9所大学的调查,知识分子的患病率高达50%以上。中国科学院部分研究所统计,1987年上半年,有8人早逝,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者仅有33岁。著名数学家张广厚即属此例。中年人发病的原因与运动量不足、膳食结构不合理、不注意休息、心理状态不佳等有密切关系。所以,中年人要重视自我保健,才能在英年时为祖国多做贡献。

要加强体育锻炼 据调查,平日不爱活动的人比喜欢活动的人,其心脏要早衰10~15年,冠心病的发病率要高出1~3倍;即使同患冠心病,喜活动者表现为心绞痛者为多,且症状较轻;不爱活动者,则以心肌梗塞为多,症状较重。因此,人至中年,应克服“懒”字,争取更多的时间参加运动锻炼,如骑

自行车上下班、爬楼梯、散步、慢跑、游泳、体操、打拳、击剑等等。但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坚持始终。

膳食结构应合理 注意补充些蛋白质。若长期低蛋白饮食,可使人早衰、早老,如易疲劳,记忆力下降,皮肤起皱,牙齿松动,办事能力锐减,免疫功能下降,甚至对癌细胞失去“免疫监护”作用。合理的膳食结构应当是:高蛋白、低脂肪、多维生素、少食糖、富纤维、限盐量。

劳逸结合会休息 紧张工作之后,要适当放松和休息,到室外散散步,吸收新鲜空气,或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千万不能长期拼体力。牢记“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坚决戒烟少饮酒 吸烟对心脏、神经、免疫系统及家人都有损害;少量饮酒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过量会伤害神经、心脏和肝肾。

心理状态要良好 中年人一般家庭负担较重;工作上承担的任务也较重,如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就可能造成不良的心理状态。研究证明,忧虑、发怒、不安、烦躁、悲伤,均可造成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的发生,或促成死亡。因此,中年人应不愁、不气;气平则息,心宽体健。

定期作健康检查 不能怕麻烦,不能说没有病,也不能说没有时间,查查没有事也放心,有病早治,防患于未然。■

反射性晕厥是由于调控血压、心率的神反射弧障碍而致心脏抑制,心搏出量及血压下降而致晕厥。正常情况下,脑血流量高于机体其他组织,成人脑重约为全身体重的2%,脑血流量约占全身血流量的15%左右。如果脑血流量突然降至每100克脑组织血流量30毫升以下,或机体平均动脉压下降至7.98~10.64千帕,便会导致脑供血广泛下降而产生晕厥。

反射性晕厥常见有六种类型:①血管抑制性晕厥,又称单纯性晕厥,是由于各种刺激引起迷走神经兴奋,反射性引起血管床扩张,血压下降,心输出量减少而致晕厥。诱因多为剧痛、紧张、恐惧、焦虑、疲劳及环境通风不良、闷热、接受注射或手术等。②体位性低血压晕厥,也称直立性低血压晕厥,为自发性或继发于其他体位,如卧位、蹲位后突然起立或久站后突然晕厥。③颈动脉窦综合征,多见于60~70岁老年人,平素有动脉硬化或血管舒缩不稳时,颈动脉窦敏感性增高,易于反射性发生晕厥。④排尿性晕厥,中青年男性为主,于立位排尿或排尿后片刻发作,多无先兆,神志丧失而倒地,约持

每当夏秋来临,一些国家的沿海城市就会有红眼病出来侵袭人群,这已成了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的时疫眼病。它起病奇快,来势凶猛,无论男女老幼,一旦被它粘上,要不几个小时,病眼迅即畏光流泪、刺痛和产生稀薄的分泌物。同时眼睑肿胀,眼白被扩张的血管和出血片染红,这就是“红眼病”名称的由来。

红眼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经专家分离鉴定,常见的红眼病病毒为柯萨奇A₂₄型(CA₂₄)和肠道病毒70型(EV₇₀),它们交替每年流行致病。

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

李小树

名家名著,影响深远,为历代所关注。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及其《三国志》即属此类。然而,对于陈寿本人和《三国志》的一些内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晋书·陈寿传》记载说:“或云丁仪、丁广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此后,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据此评论说:“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陈氏《三国志·刘后主传》去:‘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又说:“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亮乎?”很明显,唐修《晋书》的作者和刘知几都认为,陈寿在撰修《三国志》时,因个人的私利和私怨而有失公允,没有严格依据历史事实书史论人。

上述记载是否可信,评论是否恰当,不仅关系到陈寿这位著名史学家的史德,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三国志》这部了解和研究三国时期历史最重要的史学名著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弄清楚这一问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清初以来,不少学者不惜劳神费力,对《三国志》细加探究,为陈寿“辩诬”。对于向丁氏之子“索米”一事,由于《三

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明确记载:丁仪、丁广兄弟与曹植亲善,“为之羽翼”。曾在曹操面前力主立曹植为王太子,由此引起曹丕的怨恨,将他们视为自己夺取和巩固最高统治权的障碍。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为魏王之后,在排挤曹植的同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打击丁仪、丁广兄弟。“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广并其男口。”《资治通鉴·卷 69》作了相同的记载。可见,曹丕即位后,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不仅处死了丁氏兄弟,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还将其男性亲属包括他们的儿子在内一并诛杀。因而,他们已没有儿子在数十年后的西晋时期供陈寿去“索米”,唐修《晋书·陈寿传》中关于陈寿“索米”的记载不能成立已是定论。而对于陈寿“谤议”诸葛亮一事,学者们大都以《三国志》中多处盛赞诸葛亮为据来论证陈寿没有因父亲被髡而以私怨贬责诸葛亮。但是,对一个历史人物包含赞誉与贬责的评价中,其赞誉部分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其贬责部分必然合理的充足理由,这使陈寿是否“谤议”诸葛亮至今仍令人信服的结论。客观地说,陈寿父亲被髡一事如果存在,陈寿“谤议”诸葛亮的可能性就很难被完全排除。无论是唐修《晋书》的记载还是《史通》的评论,这件事都是断定陈寿“谤议”诸葛亮的根本依据和立足点。“索米”一事的诬载使我们有理由对此提出疑问。然而,直至今日仍没有人怀疑过唐修《晋书》中陈寿父亲被诸葛亮处以髡刑这一记载本身的真实

性。对于这条记载,虽然不象“索米”一事,有着直接而明确的史料加以否定,但倘是诬载,便难免不露出破绽。笔者认为,这条记载与历史事实不符,在此提出如下质疑,冀为引玉之砖,使这一问题最终得以澄清。

一、“寿父为马谡参军”质疑

如果仔细阅读史料,我们便会发现,街亭之役时,马谡本人的职务恰恰是参军。史籍中关于街亭之役时马谡的职务有下述几条记载:

1.《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弟马谡传》:

良弟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2.《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从曹公征汉中,因降先主,拜牙门将、裨将军。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

3.《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建兴)六年春,……亮身率大军攻祁山,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参军襄阳马谡、裨将军巴西王平及张休、李盛、黄袭等在前,违亮节度,为郃所破。

4.《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魏明帝)太和二年(即蜀建兴六年),蜀相诸葛亮出祁山,遣将军马谡至街亭,高详屯列柳城,张郃击谡,淮攻详营,皆破之。

(以上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由上述第1、第2、第3条记载可以看出,马谡当时的职务是丞相诸葛亮的参军。据《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马忠传》、《蒋琬传》等记载,蜀后主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开府治事”,署置官属。

而蜀丞相官属有军师祭酒、中军师、前军师、后军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参军、行参军、掾属、令史、记室、门下督等^①。显然,马谡于诸葛亮开府之后,在丞相府中任参军之职。

根据马谡为丞相参军这一职务,我们可以得出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马谡的官属中不可能有参军这一职务。因为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作为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封建王朝的官僚系统对不同级别的官员在舆服、礼仪等方面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不得混淆,以示上下尊卑之别,在官员名称上也是如此。如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侯、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②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罢御史大夫官,“初改为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有司空,故复加为大司空,亦所以别小大之文也。”^③为了别大小,明上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内,任何一名官员与他的直属下级在官称上是不可能相同的。因而,作为参军的马谡,他的官属中不可能再有与他本人的官称完全相同的参军这一职务。所谓“寿父为马谡参军”,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

至于第4条记载,即《三国志·魏书·郭淮传》中“将军马谡”一词。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将军”为“参军”一词在《三国志》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讹误。因为在马谡姓名前冠以“将军”之号,仅此一条,《三国志》和引书达二百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等史籍中没有关于马谡被授予以将军称号的任何记载。且《三国志·蜀书·王平传》中载:“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令将军黄袭等兵。”从行文上明显看出马谡不是将军,否则此段文字应在马谡前冠以“将军”二字。第二,马谡确实被授予将军称号。但是,无论马谡的情况属于上述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我们仍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马谡的官属中不可能有

参军一职。

在第一种情况下马谡的官属中不可能有参军一职,我们在上面已作了论述。在第二种即马谡确实被授予将军称号的情况下,马谡的官属中同样不可能有参军一职。因为其一,《三国志》中对拥有将军称号的将领,其称号记载分为两类,一类是记其全称为“某某将军”。如“骠骑将军”、“征西将军”、“镇东将军”、“前将军”等等;一类是简称为“将军”而不具体记载是何种将军。这两类记载的区分原则为:对曹魏政权,高级将领,即四品以上的将军,都用全称,不用简称。中级以下即五品以下的将军,则常常使用简称,只称将军^④。刘蜀政权将军的品秩虽然史无记载,但其名称及地位与曹魏政权的将军基本相对应,这是为历代所公认的^⑤。在《三国志》中,其全称和简称的使用原则与曹魏政权也是相同的。由于对马谡使用的是简称,因而可以断定,马谡即使为将军,也是中级以下的将军,而这些称号被简称的中级以下的将军,其官属中是没有参军一职的^⑥。

其二,根据《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职官表》、《三国会要》等史籍的记载,刘蜀政权中的带将军称号而官属中有参军者只有大将军一职^⑦。刘蜀政权大将军的初置时间为蜀后主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任过此职者共三人:蒋琬、费伟、姜维^⑧。马谡早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即被处死,未曾任过大将军,因此,他即使被授予将军称号,官属中也不可能有参军一职。

由上可见,所谓“寿父为马谡参军”之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也不可能有陈寿父亲在街亭之役时因任马谡参军而受坐被诸葛亮处以髡刑的事。

二、“寿父亦坐被髡”质疑

根据《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华阳国志》等书的记载,街亭之役发生于蜀后主

建兴六年(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春,马谡在街亭战败之后便畏罪“逃亡”^⑨,王平则“徐徐收合诸营遗众,率将士而还”^⑩。诸葛亮不得不“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⑪。从街亭失利到退回汉中,显然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王平的“徐徐”合营退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裴松之注引《袁子》说:街亭失利后,诸葛亮率领蜀军“徐行”,都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缓慢过程。这不仅因为诸葛亮行军向称稳重,所谓“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且带着“西县千余家”百姓,“驱略士女数千入还蜀”的蜀军,其行军速度之慢是可想而知的^⑫。

退回汉中后,诸葛亮将“逃亡”的马谡捉拿并处死,随军的丞相长史向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⑬。显然,诛马谡与免向朗官是同时的,陈寿父亲如果受坐“被髡”,不会早于上述两件事。因为“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在时间顺序上是很清楚的。那么,诛马谡与免向朗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裴松之注说:“臣松之案: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这是有关这两件事发生时间唯一的较为精确的记载,即“建兴六年中。”“中”用于较为具体的时间时,其意为“半”,即时间之半。如《春秋·庄公七年》载:“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杜预注:“夜半乃有云星落。……夜中,夜半也”^⑭。因而,“年中”当为一年之半,即一年的6—7月。“建兴六年中”也即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的6—7月。如果陈寿父亲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当在这一时间。

秦汉时期,髡刑为“五岁刑”,即五年期刑,《汉旧仪》载:秦汉时代“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程树德先生在其《九朝律考·汉律考》中的结论为:汉代“髡刑,五岁刑。”日本学者堀毅在其《秦汉刑名考》中说:程树德将汉代髡

刑考为五岁刑,“这一观点以后成为定论”^⑤。另一日本学者西田太一郎博士在其所著《中国刑法史研究》第十一章《肉刑论所反映的刑罚思想》中列举汉文帝废除肉刑后,汉代新刑制所作的规定为:“髡钳城旦舂(五岁刑)”。中国当代学者孔庆明先生在《秦汉法律史》中也认为:“汉文帝进行刑罚改革之后,汉代的各种劳役徒刑逐渐地形成固定刑期。……五岁刑:髡钳城旦舂。”^⑥其中,髡是剃掉其须发,钳是“以铁束颈”^⑦,是作为五岁劳役刑的附加刑。而《三国志·魏书·王凌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记载说:汉献帝时,“凌为长,遇事,髡刑五岁,当道扫除”。可见直至东汉末,髡刑仍为“五岁刑。”

刘备即位,号称是汉代皇室后裔,“惧汉祚将湮于地”而称帝,要“嗣武二祖”,将汉朝刘氏政权延续下去^⑧,连国号都未改动,仍旧为汉。因而各种制度基本沿袭东汉,刑罚也不会例外。据此,则陈寿父亲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如果属实,当服五年刑,即自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6—7月始,至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6—7月止。由于诸葛亮不主张轻易使用赦免措施,号称“惜赦”^⑨。因而在他执政期间没有颁布赦令。建兴六年至建兴十一年这五年中,蜀汉政权没有赦令颁布,陈寿父亲如果“受髡”服刑,刑期不可能减少,因而他最早也要在蜀后主建兴十一年六月才能刑满归家。而据《晋书·陈寿传》载,陈寿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卒,时年六十五。”由此逆推,陈寿的出生年代为蜀后主建兴十年(公元232年)或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最晚不得晚于建兴十一年十二月。即使以最晚时间计算,距陈寿父亲刑满返家的时间也最多不超过六个月,陈寿的母亲没有足够的时间怀胎十月,生下陈寿。对此的解释只有一个:陈寿的父亲没有受过刑期五年的髡刑,所谓街亭之役后,“寿父亦坐被髡”的记载与历史事实不符。

三、陈寿被诬探源

从以上两方面的质疑可以看出,唐修《晋书·陈寿传》中所载“寿父为马谡参军”、“寿父亦坐被髡”,皆与史实不符。也就是说,陈寿的父亲没有受过唐修《晋书》中所说的诸葛亮的处罚与污辱,陈寿因而不可能以所谓“父辱”这一并不存在的私怨而“厚诬”、“谤议”诸葛亮。相反,倒是作为一名优秀史学家的陈寿本人受诬千载,难得昭雪。

那么,陈寿去世三百五十余年后唐代官修《晋书·陈寿传》中关于陈寿父亲被诸葛亮处以髡刑,陈寿因“父辱”而谤议诸葛亮等诬载源自何处呢?看得出,唐修《晋书》在记载此事时,对其可靠性并无十分的把握,因而使用了“或云”这一并非肯定语气的措辞,以示此说不是定论。据现存史料,这一说法最早载于王隐《晋书》。《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孝标注中说:“王隐《晋书》曰:‘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好学,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亮子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将这段记载与唐修《晋书·陈寿传》的有关内容相比较,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渊源关系。南朝梁代学者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书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号为宏富。其中引虞预《晋书》、朱凤《晋书》、干宝《晋纪》等晋史十多种,但记陈寿事只此一条且专引王隐《晋书》,从而使上述渊源关系更加清晰。

王隐为西晋末东晋初的史学家,唐修《晋书》中有他的传。他是晋代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父亲王铨曾任历阳(今安徽和县)县令。王铨好学有著述之志,曾私自撰录西晋史事及功臣行状,未成去世。王隐继承父志,立意著述,东晋初被授著作郎之职,“令撰晋史”^⑩,后遭谤免官,在家私修晋史,于东晋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撰成《晋书》奏上。唐太宗贞观年间,“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

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①。于是房玄龄等人奉诏重修《晋书》。他们在撰修新的《晋书》时,“以臧荣绪为本,摭摭诸家”^②。王隐《晋书》是诸家晋史中撰修较早的一部,他的一些记载被采入唐修《晋书》中是很自然的。因而,上述王隐关于陈寿父亲任马谡参军,为诸葛亮所毙,陈寿挟私怨贬责诸葛亮等记载以基本相同的面貌出现在唐修《晋书》里,便不足为怪了。

遗憾的是,王隐著史,态度并不十分严谨。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庞德传注》中说:“王隐《蜀记》曰:钟会平蜀,前后鼓吹,迎德尸丧还葬邨,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德死于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则其尸丧不应在蜀。此王隐之虚说也。”指出了王隐有的记载不可信。刘知几则在《史通·古今正史》中说:“(王)隐虽好著述,而辞拙才纯。其书编次有序者,皆(其父王)铨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隐所作。”在《史通·杂说中》里又说:“王(隐)·檀(道鸾)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值得注意的是,陈寿生前曾与几位过去的好友因嫌隙而终至相互攻讦。《华阳国志·王化传》记载说:王化少弟王崇在蜀亡之后“与寿良·李宓·陈寿·李骧·杜烈同入京洛,为二州标俊。五子情好未必能终,惟崇独以宽和无所彼此。”《华阳国志·李宓传》又载:“寿良·李骧与陈寿祚相长短,宓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华阳国志·陈寿传》更明确地指出:“时梓潼李骧叔龙亦雋逸器,知名当世。初与寿

齐望,又相昵友,后与寿情好携隙,还相诬攻,有识以是短之。”很明显,陈寿曾受到过去好友的“诬攻”。所谓陈寿父亲为马谡参军,因街亭之失而受坐被毙,陈寿由此怨恨诸葛亮,不据实记述史事,评价人物,对诸葛亮加以“谤议”云云,这些与史实不符的说法,极有可能就是李骧等人对陈寿的“诬攻”之辞。被喜好蜀事,撰写过《蜀记》而著史态度又不甚严谨的王隐不加详辩地载入其《晋书》中并为唐修《晋书》所采录,从而误传千年。然而,古今著史,论人记事,贵在真实,既是“诬攻”,终究会露出马脚。王隐失于详辩,贻误后世,当为后世治史者鉴。

①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②《汉官仪·卷上》。③《通典·职官二》、《汉官仪·卷上》。④见《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蜀书·王平传》。⑤《三国志·蜀书·王平传》。⑥《通典·职官十八》、《三国志·蜀书·王平传》。⑦《三国志·蜀书·姜维传》。⑧《汉将相大臣年表》。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⑩《三国志·蜀书·姜维传》。⑪《三国志·蜀书·姜维传》。⑫《春秋左传正义》第八卷。⑬《日》施毅:《秦汉法制史考论·秦汉刑名考》。⑭《秦汉法律史》第十章第二节。⑮《汉书·高祖纪注》。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⑰《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表注。⑱《晋书·王隐传》。⑲《史通·古今正史》。⑳《唐会要》卷63、《册府元龟》卷556、《旧唐书·房玄龄传》。

(李小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邮编 100872)

(责任编辑:强 胜)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人失误管窥

张安峰

《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是作者依据历史人物的真实,结合民间传说,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的一个“贤相”典型。作者倾注满腔热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从隆中一对到六出祁山那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以崇奉的心理、赞美的笔调讴歌了他献身蜀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从而使诸葛亮这个名字千古流芳,家喻户晓,成了广大民众心目中智慧的化身。然而,就在作品极力颂赞他的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诸多不足。比如伐魏战争中军事才能的欠缺;关羽、刘封死后人情的淡漠等。本文拟就他用人失误谈一孔之见。

一、对关羽的放纵

误用马谡,痛失街亭,导致一出祁山功亏一篑,是《演义》里唯一明记于诸葛亮名下的用人不当。然而与此相类的误用关羽,敞开华容道,使必死无疑的曹操安然脱逃,诸葛亮不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关羽反倒因此赢得了重情尚义的美名。

街亭、华容道皆为战略要地,马谡、关羽都是奋勇请缨,诸葛亮同样在反复强调后又再三叮咛,为了以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重责,马谡、关羽也同样为了表示誓死不负重托的决心,出师前都立了军令状,而结果同样是失守。不知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非常相似的事件,近乎雷同的写法,在整部作品里是绝无仅有的。不同的是,马谡在街亭遭遇的是司马懿率领的、专取街亭的20万大军,而关羽在华容道守候的是跟随曹操逃命的、“人马尽乏”的300余骑败兵。马谡是因食古不化,战术不当,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溃败的;而关羽则是因一己私情,在唾手可得的形势下放走了曹操。按照刘备讨贼除奸、复兴汉室的政治纲领,翦灭曹操应该比攻城略地更重要。依据错误的性质,关羽比马谡更该杀。然而结局却恰恰相反。如果说挥泪斩马谡是诸葛亮执法严明的表现,那么,对关羽不加任何责罚的不了了之,就是他徇私枉法的明证。虽然小说曾以“亮夜观乾象,曹操未合身亡”对此作过解释,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诸葛亮在刘备提醒下,意识到自己用人失误后的一种掩饰。一出祁山时,谯周以“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的天象劝阻诸葛亮,“孔明曰:‘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注同,卷十九第二节)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不拘执于天象的。如果他真的认为曹操不当死,那么前边立下的军令状岂不成了军中戏言,成了对关羽的有意捉弄?

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并未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再一次误用关羽守荆州。

荆州,是《演义》所描述的中心战场,孙、刘为此长期明争暗斗,曹操也从未放弃吞并之心,所以刘备在攻守兵力的配置上,留守荆州的将士远比攻取西川的人马精良。然而,当庞统战死、刘备求援时,诸葛亮却带走了张飞、赵云,只留下本来就骄傲自大、意气用事的关羽守荆州。对这一事关重大的人事安排,小说交待得很清楚,“孔明将玄德书对从官曰:‘主公书中把荆州托在我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当然,由此造成的恶果,他也难辞其咎。在平定蜀川、攻取汉中后,诸葛亮既没给“托在我身上”的荆州增兵布防,也没有动摇关羽荆州之主的地位。当关羽不愿与黄忠并列,声言要入川与马超比试高下,骄横之气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时,诸葛亮非